

知识分子图书馆



后革命氛围

〔美〕阿里夫·德里克 著 王 宁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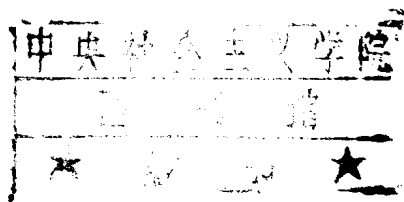
0104020



〔美〕阿里夫·德里克 著 王 宁 等译



2010402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革命氛围/(美)德里克(Dirlik, A.)著;王宁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560-0

I. 后… II. ①德… ②王… III. 政治学-研究-文集
IV. 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31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4

字数:27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9.00 元

01-182/23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知识分子图书馆》部分书目

- ①文学行动* 雅克·德里达
- ②解构之图* 保罗·德曼
- ③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 斯坦利·费什
- ④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 莫瑞·克里格
- ⑤快感：文化与政治*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⑥布莱希特与方法*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⑦论解构* 乔纳森·卡勒
- ⑧重申解构主义* 希利斯·米勒
- ⑨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 冈特·绍伊博尔德
- ⑩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罗钢 刘象愚主编
- ⑪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谢少波
- ⑫后革命氛围* 阿里夫·德里克
- ⑬赛义德自选集* 爱德华·赛义德
- ⑭政治无意识*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⑮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特瑞·伊格尔顿
- ⑯本雅明文选* 瓦尔特·本雅明
- 文化研究读本 雷蒙德·威廉斯等
- 历史和人文科学中的历史 拉尔夫·科恩主编
- 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 布鲁斯·罗宾斯
- 后现代性的起源 佩里·安德森
- 吉尔·德勒兹：哲学戏剧 米歇尔·福柯等
- 介入的区域 佩里·安德森
- 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佛克玛主编
- 性贸易及其政治经济学 《社会文本》编辑部
- 狱中札记 安东尼奥·葛兰西

(注有*的已出版。)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编者前言

正如本书题目和作者序所揭示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全球性的转型时代，传统的描述方法和理论术语在新的时期显然已经过时，或者使用起来显得牵强附会，因而在我们所从事的文化学术理论界和批评界，便出现了一种理论更新甚至“术语轰炸”的趋向，各种各样的“后学”在这一时代应运而生，占领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领域，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后人道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革命”等。这些术语的出现自然受到固守传统或坚持现代性话语的学者的反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拍案而起为捍卫现代性的合法性而奋战。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与“后”相关联的学问或理论排斥出学术的殿堂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和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术语所描述的种种理论思潮和社会文化现象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知识生活中的，有些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了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行动准则。因而对这些“后学”作一番理论辨析，甚至找寻出其源头还是颇有必要的。

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界和史学界，阿里夫·德里克可算是为后学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尽管他始终踟蹰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娴熟自如地运用前者的批判思想和后者的解构方法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尤其是他对全球化（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和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变体）的研究不仅在近年来的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有着很大影

响，而且这一影响已进入了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文化学术界。如果说，前三个术语的创造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并且出自别人之手的话，那么后两个术语则出自德里克之手，他不仅对包括这两个术语在内的所有这些术语所包含的深刻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精确界定作出了贡献，而且他还是这后两个术语所展现的现象的权威性描述者和构划者。因此本书把德里克写于 1985—1995 年间的论文置于“后革命”这一宽泛的标题下还是颇为适当的。正如作者在中文本序中所言，随着当代形势的变化，“这套术语取代了早先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三个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那套术语……从当代视角看来，它们却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因而再也无法用来描绘当今世界”（第 1 页）。确实，欧洲中心主义的解体客观上为美国的文化霸权的长驱直入铺平了道路，全球化就是既对欧洲同时又对第三世界产生冲击的一个隐匿着美国霸权主义的现象，现在这种冲击已经波及到中国，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使我们有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而对全球化现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通过分析它的理论渊源来正确把握它的当代形态，从而使之为我们的发展服务。在这方面，德里克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参照。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和后人道主义主要用于描述西方文化和文学在某一特定时期和文本中出现的现象和代码的话，那么后殖民理论及其研究的诞生则与第三世界写作和理论批评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德里克在杜克大学的同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当之无愧的权威性理论家，但是对于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思维模式，把后现代理论经过改造之后用于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现状，则不是詹姆逊的长项，相反，德里克在这方面游刃有余，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里克丰富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这一点完全可在他和张旭东为美国后现代研究权威刊物《疆界 2》(*boundary 2*) 主编的“后现代主义与

中国”专辑中见出，那本专辑所产生的影响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对于突破后现代研究领域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承认，德里克在某些方面也受到詹姆逊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阐释和运用上，但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时流露出来的观点使我们不难看出他与詹姆逊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这主要体现在他基于东方文化背景和知识对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后殖民和第三世界批评的质疑和研究。德里克不无创见地指出了一个西方学者往往视而不见的事实，即“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假如全球化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那么就要通过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实现，因为这三者都曾经是全球化的产物并以某种方式为其成型做出了努力，或者像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甚至限制过它。”（第9页）而当这两种思潮在世界风云的变幻中退居后台时，全球化便被推到了前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论述后殖民主义时，德里克把追踪的触角伸向对有着根深蒂固观念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批判，而在描述后社会主义现象时，则追寻社会主义时代的种种理论准则，试图为人们提供一种“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模式，而贯穿这一切之中的则是全球化这一普遍的现象。

毫无疑问，后殖民、后革命都是处于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现象，在谈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德里克指出，“全球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中的发展主义假定，而后殖民主义与全球主义不一样，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为当前权力结构做辩解，倒不如说它是对这种结构的妥协……我曾提议，把现在的形势描绘成后革命的要比后殖民的更贴切，因为作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选择革命，更倾向于去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第174页），因此，这种状况虽然算不上是一种反革命，至少不能算作革命，那么就干脆叫“后革命”，它在

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与权力机构的共谋。“后革命”照我的理解，也即在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结束了一段时期，在“后革命”时代，各种势力既相互斗争，但更多的则是相互渗透，相互妥协和对话。推而广之，后殖民包含的既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扬弃，同时在这种批判和对抗中又孕育了一种新的殖民形式，也即之于第一世界的反殖民，而之于第三世界的则是新殖民；同样，后社会主义也同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的扬弃和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吸收，这在德里克看来，显然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基于这一立场，德里克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时，便笼统地将其归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抛弃，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这是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的，至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及的。当然，各国的国情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的理解或重新阐释也是在所难免的，因而在一个坚持基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有节制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合理经验和管理模式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如此。这一点也许德里克并未意识到。

同样，在文化领域内，欧洲中心主义也形成了一种霸权，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传统，德里克挥舞着解构的大棒，在各种场合对霸权主义予以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对旧的文化传统的批判，也必须着手对一种新的文化进行建构，在这方面，德里克显然不同于解构主义理论家，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号召“要创造一种新的全球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过去的……只有创造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新文化，才能克服文化主义霸权。这样一种文化必须从现在的社会的成分中锻冶出来，因为任何其他选择都不免把异化重新引入文化进程当中。”（第223页）用他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显示，也即“全球中的地方”，全球的因素与地方的因素在许多方面混杂在一起难解难分，经过东西方文化冲突

与交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必然同时打上外来影响和本民族特色的印记，这正是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德里克实际上在告诫我们，文化建设并非要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过于强调西方影响就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失去，反之，执着于旧有的传统而不思进取，同样也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只有超越这两种局限才能达到一种自觉的文化建设和理论建构的高度。

作为一位有着第三世界文化背景又生活在西方的中心美国的知识分子，德里克自然格外关心第三世界问题，但他的研究视角却是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进行质疑开始。毫无疑问，对于三个世界之划分，德里克曾经是热切的支持者，但近十年来，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前苏联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和全球化浪潮的袭来，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三个世界已经逐渐演化为多极角逐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互相对峙和对话，各种民族文化的冲突和交融，造成了当代世界的新的格局，用我在一本书的标题中所总结的，这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第二世界的解体，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也造成了这一曾经试图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了贫富差别，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全球化。德里克的创见不仅仅体现在对第三世界理论的质疑和解构，更在于他提出的由“土著居民”等地方化或本土化势力为主的“第四世界”的概念。尽管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并未深入，但对第三世界概念的解构却是相当彻底的，“当今对第三世界概念的彻底批判必须包括：第一，区分现在与过去……第二，因此，还有必要区分不同的第三世界话语隐含的结构情景。第三，同样的话语也适用于第三世界概念本身固有的批评性政治议程”。（第70页）因此，他在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消解的同时又对其原有的内涵作了新的充实。

读者也许可以从本书部分篇章的标题以及作者所论述的种种现象看出，德里克是一位专攻东方学的西方学者，或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少有如此广博的学识和重大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大

多数从事后现代和后殖民研究的西方学者一样，德里克也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说来，他也可算作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著述中。和赛义德一样，他对东方主义的理论概念和西方的东方学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对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始终抱友好的态度。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本人既有着东方血统，同时又是一位东方学学者，因此他对赛义德未提及东方人对东方主义或东方学在西方的形成所作的贡献表示不满，他提出的问题是，“东方主义究竟只是欧洲人的一个自发的创造，还是在最初就融进了一些‘东方人’的贡献？”（第280页）在德里克看来，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欠缺在于它忽视了东方人在这一有关东方的话语的展开中的参与……如果不说东方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在其起源和历史上的联系，那它的合理化在某些基础方面仍要求有‘东方人’的参与。在实践中，东方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形象与描述的交流之面目出现的，这与学者和其他人的往来沟通相呼应。”（第292页）因而一种可能性的论断就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东方人的东方主义”，这包括“东方化的西方人”和有着东方血统和知识背景但现在生活在西方的东方人建构出来的东方主义，而德里克自己的建构和批判显然是后者。

作为一位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现实的西方学者，德里克自然也格外关注儒学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区的复兴以及儒学与后殖民性的可能的联系，这可以说是其他西方学者所难以做到的。他首先对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区内的“儒学”的复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三十年代起，新儒家再次肯定儒学传统的‘固有价值’，试图重新诠释儒学，把它改造为能够包容民主与科学的‘道德—精神’体系……实际上，新儒家是对‘唯科学主义’现代化的实证主义论调进行质疑的反现代化论者，他们拒绝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提倡中国式的现代化”，因此，“八

十年代儒学运气的逆转伴随着其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转折。一夜之间突然改变的并不是儒学的内容，而是对这一内容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评价。”（第 231—232 页）他在针对一部分西方的东方学学者把儒学抬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大加渲染颇不以为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此讨论的结果对儒学也无益处。因为儒学鼓吹者把儒学推广为所有东亚社群的文化特征，从而完成了儒学东方化的过程”，而“近年来，中国大陆把孔子从博物馆搬到了公开论坛——全球资本主义下历史最新的藏身之处。80 年代的儒学话语将孔子变为东方‘钱袋’”，这样以来的最终后果表明，“最近的儒学复兴实则敲响了儒学的丧钟”。（第 261—262 页）这一尖刻的话语虽不无偏激，但也不妨对我国学者大力鼓吹儒家、排斥其他的做法敲响了警钟。

正如作者所言，收入本书的十篇论文，大都是写于 1985—1995 年间的，反映了作者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按照这些文章所论述的主题和内容，可大致分为下列几个部分。

第一编的三篇论文均探讨了全球化的现象，属于作者这十年间思考和著述的主要内容。作为当今西方学术界同时在全球化、后殖民和第三世界等不同领域内的研究成就斐然者，德里克始终对全球化保持一种冷静的辩证态度，一方面，他有力地批判了（坏的）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着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因而导致了大多数人被边缘化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他在承认全球化是一种不可改变和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的同时，认为中国过去曾欢迎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今天也应该欢迎“全先生”的到来。可以说，这一编的几篇论文为全书的其他文章奠定了理论阐述的基调和论述的主线。

第二编的四篇文章则反映了作者在探讨全球化语境之下的后殖民问题时的思考。在这部分论文中，德里克不仅从西方汉学家